

1930 年前后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宋镜明, 吴向伟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1930 年前后, 李达在白色恐怖中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正确地回答了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趋向; 适应中国抗战需要, 写出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 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撰写《经济学大纲》, 全面而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关键词:1930 年前后; 李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 8;B 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5)04-0043-06

大革命失败后, 李达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 撰写和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科学著作, 达到了他一生的学术高峰。侯外庐曾指出,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的党内外众多学者中, “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 无一人出李达之右。”^[1]这充分肯定了李达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历史贡献。

一、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必要前提

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在严酷的环境中仍顽强地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 是这一时期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之一。

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 李达继续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1928 年冬, 他与熊得山等创办昆仑书店, 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1930 年, 在我国首次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1 卷第 1 分册, 陈启修译)、《政治经济学批判》(李达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册, 钱铁如译)。此后, 还出版了一本署名为恩格斯的《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1932 年, 李达创办了笔耕堂书店, 继续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中期, 李达亲自翻译出版了 13 本包含经典著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 累计近 5000 页之多。其中, 1930 年翻译的马克思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 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此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还有日本穗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山川菊荣的《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与钱铁如合译)、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日本河上肇的《马克

收稿日期 2014-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10&ZD062)

作者简介 宋镜明,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吴向伟, 法学博士,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王静等合译)、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论》(与陈家瓚合译)、德国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苏联米哈列夫斯金的《经济学入门》、拉比拉斯等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与熊得山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与雷仲坚合译)以及卡洛夫等著的《世界史教程》(合译)。上述这些书籍的翻译出版,为中国广大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唯物辩证法,认识中国革命提供了条件。在当时我国兴起的唯物辩证法运动中,李达所做的翻译介绍工作“成绩最佳,影响最大”,他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2]。

在李达这一时期的译著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在“译者例言”中指出:“本书是集体研究的结晶,是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这一著作的显著特点,是突出了列宁的哲学思想,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这部书在苏联是1931年出版,李达等在1932年就翻译到中国,这是非常及时的,切合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这本著作出版后,很快流传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认真阅读过该书的1935年和1936年两个版本。1936年11月~1937年4月,在大约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其他空白处,写下了“近12000字的批语”^[3],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画,画了直线、曲线、曲线加直线、二直线、三直线、圈点、双圈、三圈等符号。在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的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次达1000多字。大约在1941年,他又在这本书的第四版上做了一些批注。既有对原著的简明而精辟的概括,简短赞同的评语,也有对书中观点的批评、引申,更多的是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阐发。毛泽东曾致信易礼容,称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甚表同情”,希望能与李达“建立友谊通信联系”^[4](P47)。毛泽东还致信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建议将“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作为理论学习和研究思想方法的参考材料^[5](P189)。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第一章,选录的就是这部译著的第一章。

在当时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毛泽东能够读到的马列哲学原著非常有限,当时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和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译著,就成了毛泽东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中介”。李达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为毛泽东撰写《实践论》、《矛盾论》等著

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受该书的启发,毛泽东发挥和创新了某些哲学原理^[5]。

二、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趋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从1929年1月到9月,李达先后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三部著作,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是第一部“从经济里去探求”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专著,也是一部探讨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专著。

李达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6](P388)“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过程和产业革命的过程,确有因果的关联,我们要获得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惟有在中国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去探求”^[6](P390)。李达撰写本书的目的和动机很明确,就是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早在1923年,李达就指出,无产阶级进行中国革命,要“按照中国国情”,即“要根据当时的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6](P212)。这是李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初萌芽。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李达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必须“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他指出,采用什么主义发展中国的产业,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所命定的,也是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所命定的。他说:“中国社会是个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有不同的特征。假使忽略了这个特性,就不能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6](P489)这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

在这部著作中,李达运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分析方法,阐明了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产业迟迟不能发展的原因: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二,封建政治的剥削;第三,土豪地主的剥削。而这些原因,可分为主要的和附带的两大类。“所谓附带的原因,如资本缺乏、企业者智识能力之缺乏等;所谓主要原因,如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

制度的存在”^[6](P478)。由此李达得出结论:处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的中国,幼稚的新式产业,决没有顺利发展的余地,即使稍有发展的机会,也只限于国际经济侵略所不能及的时间和空间而已,然而发展的可能性确是很有限的。“由此可知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打破,中国的产业是没有发展的可能的”。同样,“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的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这是任何人都能知道的”^[6](P488)。

《社会之基础知识》剖析了现代资本—帝国主义的特征,并着重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阐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二是在分析中国的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的前途。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达到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6](P559)《民族问题》一书,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进一步揭示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与被压迫阶级的革命之关系,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李达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到了被压迫阶级的世界革命,已经上了世界史日程的时代,民族问题由国内的问题,变为国际的问题,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枢纽”^[6](P589)。本书的落脚点在于论证“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从剥削与压迫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6](P605)。

李达的这三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而深刻地回答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与此相关的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前途以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正确回答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

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理念。李达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研究现代中国革命社会和革命的具体问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趋向。

三、撰写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社会学大纲》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李达用三

四年时间逐渐写成的。20世纪30年代,研究和传播唯物辩证法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正是这场运动的标志性成果。同时,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革命人民需要理论指导,正是适应这一需要,李达撰写了这部著作。他在该书第一版扉页写着:“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

《社会学大纲》问世之前,中国的学者(包括李达本人)撰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但还没有出现以教科书形式全面系统地论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比较系统的此类论著都是译著。确如毛泽东所说,《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学大纲》没有直接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但它的中国特色已十分鲜明,决不是国外教科书的改编,而是中国人自己的特殊眼光和独立见解的著作。这部著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完整准确的阐述,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超出了同时期苏联教科书的水平^[7](P2-3)。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内容,虽没有新的创见,但基于数年的研究,自信还有一些新的收获。”^[8](P5-6)这些“新的收获”,体现了《社会学大纲》的特点和优点,特别是它的独创性,这些鲜明的特色集中表现在:

第一,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社会学大纲》没有像以前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大块”,而是发挥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整钢”的思想,科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李达认为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具有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关联”。一方面把辩证唯物论当作世界观看待,包含着两个部分,两个领域,即唯物论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历史观(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论与自然辩证法,同是辩证唯物论之必然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把辩证唯物论作为认识的方法论看待,它具体运用于自然领域,就成为自然辩证法;具体运用于历史领域,就成为历史唯物论。因此,“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具有极密切的关联。”^[8](P283)没有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就不能成立;没有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在《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虽只写了一篇,历史唯物论写了四篇,但实际上唯物辩证法是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且份量约占全书一半。这样,《社会学大纲》首次把马

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进行阐述,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性。

第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李达坚持历史主义的立场,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全部认识史批判继承的关系。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是批判摄取人类认识史特别是费尔巴哈唯物论与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切积极成果而创造出来的东西。但是,唯物辩证法并不是对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重复,马克思主义“崭新的科学的哲学——唯物辩证法,具有其新的质、新的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8](P56)}

在此基础上,李达阐述了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改造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重要意义。李达指出,“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出来,引入于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8](P57)},即辩证法的唯物论。这样,唯物论也就从自然领域扩张于历史领域,建立了彻底的唯物论的统一的 worldview。马克思主义创始者“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在这种处所,我们可以理解新哲学的新生命、新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8](P56)}。

作者不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综合全部人类知识的伟大成果,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学说,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历史辩证法到自然辩证法,统一于社会实践而创造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从而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第三,将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位置。李达强调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关键,他说:马克思“把实践当做历史的——社会的范畴,解释为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并把它作为认识论的契机,所以能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上去理解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史,因而克服观念论哲学的抽象性与思辨性,而达到于唯物辩证法”^{[8](P56)}。他指出:“从前一切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把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当作人类学、生物学上的人类来考察,因此切离认识过程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联系,不能根据历史的辩证法去理解认识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8](P210)}李达认为,唯物辩证法的

“实践”是一个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的范畴。就本体论意义而言,实践是与人的劳动、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就认识论意义而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出发点和源泉,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唯物论从自然领域扩张于历史领域,成为彻底的、统一的唯物辩证法“科学的世界观”。《社会学大纲》把实践观点贯彻到底,对所有问题的论述都强调了基于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7](P5)}。

第四,鲜明的独创性。在“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一章中,作者指出:“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8](P132)}。李达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解释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而在阐述其他规律和范畴时,将对立统一规律加以展开和具体化,说明其他规律和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显现形态”,从而向人们展示了唯物辩证法的严谨体系。

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李达把实践的范畴引入认识论,强调“要理解人类的认识过程,必须在其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统一上去考察”^{[8](P211)}。他认为,实践与认识是不可分离地统一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的动因。实践不但证明认识的真理性和依据认识的真理性和积极变革客观世界”^{[8](P266)}。他概括了认识论的公式:“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认识的这种圆运动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去的发展过程”^{[8](P266)}。这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述的集中提炼和概括,与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认识发展规律所作的集中概括不谋而合而又各有特色^{[7](P6)}。

李达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一切社会的构造中,不论是在非敌对的社会或敌对的社会中,都是存在的”^{[8](P397)}。不过,在不同的社会,这一矛盾的性质不同。“在敌对的社会中,这种矛盾带有颓废的性质,而在非敌对的社会中,矛盾不至于发展为颓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正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没有矛盾,那就没有发展了”^{[8](P398)}。这些观点,为后来毛泽东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李达认为,过渡时期是新形态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和生成的时代”^{[8](P443)}。过渡时期的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义的‘诸要素、小部分、小片’”,“过渡时期经济的最大特征,是社会主义要素对于资本主义要素的克服。”^[18](P445)过渡时期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社会上勤劳的多数者的民主主义,是对于少数者的专政,是对于旧压榨者的专政。”^[18](P547)

这部著作出版后,李达立即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指出,这是一本好书,在十年内战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9]在给李达的信中,毛泽东热情地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称赞这部著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用日记记下了自己读此书的进度,并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合计3500字。除文字批注外,毛泽东在书的原文中,还画了直线、曲线、曲线加直线、二直线、三直线、圈点、双圈点等符号。1939年艾思奇编辑出版的《哲学选辑》收录了此书的《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一章。1948年7月,新华书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按篇分为5册重版此书。1961年8月,毛泽东在与李达的谈话中再次肯定了《社会学大纲》,说:“这本书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现在还有意义,应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为着同一目标而奋斗的战线,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另一就是并不直接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术研究和宣传。第一条战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第二条战线则以李达为代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李达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中介,是列宁阶段走向毛泽东阶段的中介,为毛泽东思想的创造作了学理上的准备^[10]。《社会学大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富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提供了学理上的重要工具。

四、撰写《经济学大纲》,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李达撰写的《经济学大纲》,在1935年由北平大学商学院作为教材刊印。《经济学大纲》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著作,也是李达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代表作。

这部著作阐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构成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即社会的经济构造。”^[11](P4)所谓社会的经济构造,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即适应于生产力的各种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之总体”,这种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相适应的,因此,“以经济构造为对象的经济学,不但研究生产关系,并且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11](P10-11),也就是说,既要联系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来研究生产关系的总体,又要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发展。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李达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概念。广义经济学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相互转变的法则。而狭义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及没落的法则,是广义经济学的构成部分。他认为,广义经济学不仅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而且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因为广义经济学,并不仅是为了求得经济学的知识才去研究一切经济构造,而实在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指导原理才去研究它们。即是说,我们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经济上的实践才研究经济学。”^[11](P15)

这表明,李达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指导原理”。他认为,研究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有助于具体的全面的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理解先资本主义经济的“那些遗物”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初期时代“如何被改造,被推进于社会主义的过程”^[11](P21)。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可以暴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则,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从而武装无产阶级以从事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可以使担负改造经济形态使命的人们,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则,从而得到行动的指导。

由于种种原因,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国经济两部分未能完成,但该著中对中国经济问题亦有所论述。在该书的绪论中,李达考察了当时中国经济的状况,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存在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即“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和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11](P23)。在这三个过程中,第一过程占据统治地位,第二过程是第一过程的附属物,第三过程被第一第二过程统治着。这种状况是现代各帝国主义国家所没有的。李达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还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

经济的过渡状态中,但是深深的烙上了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火印”^[11](P22)。就是说,中国现代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除《经济学大纲》中论及中国现代经济外,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和《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及《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论著中,也考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发展趋势。面对中国特殊的经济状态,中国国民怎样寻求自己的生路呢?“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11](P24)。从中国经济状况分析中得出政治结论,为中国革命提供理论武器,是李达研究中国经济的根本目的。

《经济学大纲》当年铅印成书后,李达立即寄往延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说:“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经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12]李达撰写的《经济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和专著,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帮助中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李达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阵地,表现了他坚定的立场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同时,他撰写和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

著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当时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的状况下弥足珍贵。李达的精神和研究成果,是他留下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侯外庐. 韧的追求[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36.
- [2] 郭湛波.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197.
- [3]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87-89.
- [4] 毛泽东书信选集[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5] 雍涛.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6, (1).
- [6] 李达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7] 陶德麟. 《社会学大纲》“再版前言”[A]. 李达. 社会学大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8] 李达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9] 郭化若.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N]. 解放军报, 1978-12-28.
- [10] 丁晓强, 李立志. 李达学术思想评传[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11] 李达文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责任编辑 张西山】

LI Da'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or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round 1930

SONG Jing-ming WU Xiang-we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Around 1930, LI Da insisted on research and propaganda of Marxism in the white terror,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or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ranslating and publishing works of Marxism, provided indispensable premise for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aying attention to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correctly answering where to go after Chinese revolution failed in 1927,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eeting the needs of Anti-Japanese War, writing Chinese first Marxist philosophy the Outline of Sociology, established the system of Marxist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riting the Outline of Economics,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expounding Marxist economics principle, promoted the spread of Marxist economics in China.

Key words: Around 1930; LI Da; sinicization of Marxism